

戊戌维新前后的容闳 及其与康、梁的关系

容闳（1828—1912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他是一位极力主张向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学习，以“改革和复兴中国”为己任的代表性人物。过去，学术界对于容闳的研究大多停留于他在戊戌变法运动以前及其早期的活动和思想主张方面。学者们在评论他时，或称之为改良主义者，或认为是个洋务派人物，甚至目之为买办。近年来，随着对他研究的深入，大家开始对他的生平有了较完整的了解，也注意到他晚年的思想变化。但对他在戊戌变法时期及其以后的活动，他与康、梁的关系，以及他如何从改良走向革命的转变历程，进行专门探讨的还很少。为此，本文通过具体史实，对这些问题进行论述。我们认为，主张维新变法，是容闳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容闳在戊戌变法时期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主要成员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相互支持，互为影响，对戊戌变法运动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以后的年月里，容闳与康、梁等保皇派决裂，转向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的晚年，闪耀了灿烂夺目的光辉。

以下，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分三个部分加以阐述。

—

19世纪80年代至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容闳侨居美国。在这段时间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加紧侵犯我国沿海和边疆，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容闳虽身在异域，却心怀故国。当1894年中日甲午

战争一爆发，他在爱国心的驱使下，一连给原先的同事、前驻美使馆参赞兼翻译蔡锡勇写下两封信，“每书皆有条陈，规划战事”^①。当时，蔡锡勇为湖广总督张之洞门下的幕僚，容闳的建议很快地被转呈给张之洞。

容闳所提建议主要为两项：一、中国速向英国借款1500万元，购置铁甲舰，雇佣外国军队5000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使日军首尾不能相顾；二、将台湾抵押给欧美列强，借款4万万美金作为全国海陆军之费用，坚持对日抗战。张之洞对第一项中关于借款的建议很感兴趣，立即发电报派容闳去伦敦向英国商借款项。容闳到了伦敦，借款事经筹商就绪，但因须以关税为抵押，遭到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留难而未能实现。这是容闳自1881年留美学生回中国后为清政府办理的第一件对外交涉。

从容闳两项建议看，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但却反映了他对西方列强不切实际的幻想。同一般资产阶级政治家一样，他还没有看清英、美等国侵华的真正面目。

然而，他的建议引起了张之洞的重视。张之洞很快就电召他回国。

1895年初夏，当容闳抵达上海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他前往南京去谒见在那里代理两江总督职权的张之洞，建议聘请外国人为中国政府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的顾问，并派有才学的中国青年学生，“置于各顾问之下，以资练习”。他认为“如是行之数年，中国行政各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重新组织也。”^②但张之洞对他这个“新政策”反应很冷淡，只授他一个“江南交

① 《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114页。

② 《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16—117页。

涉委员”的空衔头。容闳感到大失所望。

这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已十分严峻，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了救亡，资产阶级改良派已开始由言论而趋向于行动。1895年5月初，在容闳返抵国境的前夕，康有为在北京联合18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向皇帝上万言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随后，康有为又接连第3次、第4次上书皇帝。同年7月，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8月，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次年1月，又在上海出版《强学报》。不久，梁启超等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康、梁等人的维新主张虽被容闳引为同道，但初期他们并没有建立联系。在救亡图存和发愤图强的改革声浪逐步高涨气氛下，容闳于1896年夏天辞去“江南交涉委员”的职务。此后两年间，他向清政府提出过两项建议：一是设立国家银行，二是修筑全国铁路。

容闳提出创办银行的章程和条陈^①，呈送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翁称其“颇得要”，表示赞同^②，并予以上奏。这一建议由于盛宣怀的极力反对而没被采纳。

容闳最初提出由美商筹资四亿两，修筑“全境铁道”的建议，因清政府不同意而改为承办津镇铁路一条。办法改为“集股”，并允许美商“入股”^③。容闳建议借美款修铁路，本意为了抵制俄、法集团，特别是为了遏制沙俄咄咄逼人的侵华势头。在1896年的条陈里，他有如下一段话足以说明他的认识：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2册，303—304页。

②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第35册，（丙申）300页。

③ 《录容观察上总署条陈》，载《闽省会报》（1896年）第167卷，2357页；容闳《津镇铁路条陈》，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见于宝轩《皇朝经世文新编》第36卷，第13—14页；容闳《津镇铁路条陈》（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见《戊戌变法》第2册，304—307页。

“欧洲有爱我助我而实为图我，是宜远之防之，不可因一端受其惠而遽忽之者，俄、法是也。俄、法强大之国，据西北，有建瓴势，辄肯以百万兆借于我^①，只请造西伯利亚铁路绕我满洲，具有深心，一旦窃发，将何抵御！此诚我心腹之忧，……又有实在欲爱我助我，知我不遽信而不能袖手旁观，为秦人视越人，肥瘠漠不关心，我似宜借顾其力，不必深疑，只须善于驾驭，以收实利者，美国是也。”

在这里，他指出俄、法集团，特别是沙俄的侵华野心，认为沙俄是中国的“心腹之忧”，他们对中国“具有深心”，并深信美国“与我国毫无异志”。这种认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共同认识。

请筑津镇铁路。在“百日维新”前夕，康有为说，“容闳乃请筑津镇铁路，吾实助之”。在康有为的支持下，这个建议得到光绪帝的批准^②。康有为认为：“万国之中，美国最富，又不利人土地，若招集美商办此，彼必乐从”^③。说明他对美国的认识与容闳是完全一致的。

据有关资料，梁启超于1896年“始认容闳”^④；康有为虽在80年代初与同乡前辈区谔良一起创办不缠足会时，可能已知道容闳的事迹^⑤，但与容闳直接交往也是在这个时期。在为了拯救中国、进行维新的共同理想的基础上，他们相互间有了较多的了解。康有为一再向光绪帝推荐容闳，赞许“其为人朴诚忠信，行谊不

① 指1896年7月俄法借款4亿法郎，约合银1亿两。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121页。

③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1版，228页。

④ 杨复礼：《梁启超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172页。

⑤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116页。

苟”^①，又向翁同龢介绍容闳“熟悉美事，忠信，可任借款”^②。这时，容闳与康、梁可说是志同道合，而且相知较深了。

容闳修筑津镇铁路的建议虽经光绪帝批准而“奉旨允行”，但却遭到当时掌握江南各省实权的张之洞、刘坤一的激烈反对。他们无端攻击容闳，说“容系洋股，与德易于勾串”^③。而这时德国把山东视为禁脔，竟公然声明它对我国的山东省享有特权，不许任何人经山东修筑铁路。清政府屈从于外国势力，取消了筑路的建议。

创办银行、铁路的建议都没能实现，使容闳又遭到一次精神上的打击。然而，由康有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很快又使他振奋了起来。

二

容闳在自传中写道：“中国政治上当存亡危急之秋，适维新潮流澎湃而来，侵入北京。光绪帝受此奇异势力之激动，遂奋起提倡维新之事业。……予睹此状，乃决意留居北京，以覩其究竟”^④。

这就是“百日维新”。容闳是完全赞同这场变革的。早在80年代初年，他就深有感慨地认为：“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⑤。因而，在“百日维新”的新形势下，他感到格外的兴奋。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对光绪帝十分崇拜，把光绪帝推崇为“爱国之维新党”、“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中国革新的先导”，认为“其举措迥异常

①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1版，228页。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142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129，页6—7、9—10。

④ 《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22页。

⑤ 同上，第110页。

人，洵伟人也”^①。

1898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组织《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该会的宗旨，先后举行几次集会，每次都有上百人参加。容闳是其中的积极分子^②。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容闳与张荫桓、梁诚（第一批留美学生，时任道员）等人都被顽固派视为大敌。这年五月十七日（闰三月二十七日）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折参劾维新派的首要人物，控告容闳等“行踪诡密”^③。到了“百日维新”期间，容闳与康、梁、谭等维新派首要分子接触更趋频繁，许多革新派人士到容闳寓所讨论有关问题。容闳在金顶庙的住处“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④。由于容闳熟悉美国的情况，维新派一直想借助他的这个关系向美国借资以举办维新事业。“百日维新”末期（1898年9月上、中旬间），康有为在《请计全局筹巨款、筑铁路、起海陆军折》中，又一次提出方案，建议大借外款，认为“募于美国而尤易”，再次推荐派容闳赴美联系^⑤。这时，容闳已年逾古稀。他长期在国外，经历丰富，见多识广，是个老前辈，因此，作为变法运动的主要策动者康、梁、谭等人，以及一些赞同维新的京官以至于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都很尊重他。梁启超曾称他“学问最优”^⑥。

戊戌年的维新运动延续103天。在顽固派发动政变前夕，容闳曾想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设法解救。他与康有为商量，康有为

① 《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22页。

② 《李宣龚与丁在君书》，《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台北世界书局，52页。

③ 原折藏北京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

④ 《西学东渐记》122页；《戊戌变法》第4册，161页。

⑤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362页。

⑥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285页。

“以其无兵，无济于事，却之”^①，但到了政变发生的那一天（阳历9月21日），梁启超、谭嗣同还是与英国教士李提摩太商议，决定由容闳去见美国公使，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但是，这时“美国公使已去西山，而英国公使在北戴河”^②。政变发生后，容闳被“撤差”，但他却不顾个人安危函请李提摩太营救梁启超^③。康有为在逃离北京后，给李提摩太写的密信里还特别附有另函致容闳，委托李提摩太“代妥密交”，并将所有情况都告诉容闳^④。从这些情况，可以窥见容闳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有关活动及其与康、梁等人的密切关系。因此，容闳虽然有“美国国籍”作掩护，也不得不逃亡到上海，“托迹于租界中”。

变法运动的失败并没有使容闳就此灰心，相反地，他越发积极地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有志之士联系，并参加了当时汇集在上海的维新派人士的有关活动。1900年3—4月间，他曾一度去香港，与兴中会员、爱国华侨谢纘泰以及杨衢云会面，商讨政治局势以及与各改革力量联合的问题。容闳很赞同联合各派力量共同改革中国的主张。谢纘泰对容闳极为推崇，向杨衢云建议推选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⑤。

这时，被称为“康梁余党”的唐才常，在秘密筹划“自立军”起义的同时，在上海以“正气会——“自立会”为核心，筹组“中国议会”（又称“国会”）。1900年7月（农历六月），他邀请上海维新派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于张园集会。到会者数百人。容闳、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161—162页。

② 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Timothy Richard），转引自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477页，台北出版。

③ 程涓：《康南海先生墨迹跋》，《戊戌变法》第1册，421页。

④ 《戊戌与李提摩太书及癸亥跋后》，《康有为政论集》下册，1086页。

⑤ 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选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308—309页。

严复、章炳麟、文廷式、叶瀚、宋恕、马相伯、毕永年、唐才质、戢翼翠等皆应邀参加。大会公推容闳为临时会长，严复副之。集会的目的是“思用国会之名义，号召国人奋起自谋以救中国”^①。

经过短期的筹备与酝酿，7月26日（农历七月初一日），中国议会上海分会在愚园举行成立大会，正式选举正、副会长。容闳年高德劭，资历丰富，使他在爱国人士和维新派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和严复分别被推选为正、副会长，并在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这次集会，在孙宝瑄的《日益斋日记》中有着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七月一日（公元1900年7月26日），是日上海同志八十余人大会于愚园之南新厅，群以次列北向。（叶）浩吾（即叶瀚）权充主席，宣读今日联合之意。……定名中国议会。令大众以为然者举手，举手者过半，议遂定。乃投票公举正副会长，令人各以小纸自书心中所欲举之正副姓名，交书记者。书记收齐点数，凡举正会长以容纯甫为最多，计四十二人，举副会长以严又陵为最多，计十五人。于是容、严二公入座，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声雷动”^②。

在长期为封建专制所统治的中国土地上，举行了这样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投票选举，在当时可以说是未曾有过的新鲜事。3天以后，他们又在愚园开会。到会者60余人。容闳主持会议，推选出干事10人。唐才常任总干事。

“中国议会”宣传“自立会”的政治主张，为自立军起义进行

① 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6月第1版，第277页。

② 《日益斋日记》（稿本），转引自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卷9，台北世界书局1972年版，130—131页。并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6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起事成功，即暂以此会为议政之基础”^①。章太炎也指出：“唐才常知时可乘也，与侨人容闳召集人士宣言独立，然尚以勤王为名，部署徒众。欲起兵夏口”^②。

“中国议会”成立后，由容闳兼任外交事务，起草英文对外宣言，再由严复译为汉文”。《宣言》宣告：“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但又宣称：“端在起复光绪帝”。它表明，要“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与之人民”，“以谋人民之乐利，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宣言》声明承认与列强所已订的不平等条约，宣称要保护租界、教堂以及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并宣布他们的政纲是：“联合列强，废黜慈禧太后及其老朽顽固派和反动派同僚，恢复维新改良代表人物光绪皇帝的权力”^③。

这个宣言和“正气会”的章程相一致：既反对清政府的统治，准备进行武装起义，又要光绪复辟；除反映了唐才常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外，也基本上反映了容闳自己的思想认识。容闳当时还没有立即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愿望。他对光绪帝还寄予希望，存在着较大的幻想。

参加自立会上海集会活动的章炳麟虽然不赞同自立会和“国会”的保皇宗旨，但他对容闳还是十分推崇的。这年8月（农历七月），他在给陈少白的一封信中说：“友人乃立中国议会于上海，推（容纯甫）君为会长，（容）君天资伉爽，璽益精明，诚支那有数人物”^④。

① 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唐才常集》，第277页。

②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③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74—75页；章太炎《民国光复》，《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840页；〔美〕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中华书局1982年版，30页。

④ 《中国旬报》19期附刊“鼓吹录”，“论说”栏；来书（庚子年七月十五日即1900年8月9日出版）。原文受信人及（ ）内均空缺，今按信中词意推断。

1900年8月下旬，“自立军”“讨贼勤皇”的起义计划泄露，唐才常等为张之洞所捕杀。容闳在上海也无法藏身，被迫于9月1日化装易名秦西，乘轮船离沪赴日。十多天后又由日本转赴香港。

三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和自立军起义的流产，证明中国对清朝政府和封建君主制不能有半点幻想。对于这个问题，容闳通过自身的实践，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几年急剧变动的历史与严酷的现实教育下才获得这一答案。容闳的思想在晚年有了质的变化——由改良者转变为革命者。在20世纪初的头几年中，他逐渐认清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与坚持保皇立场的康、梁决裂，转而赞同并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反清、建立共和国的主张。

容闳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飞跃绝非偶然。除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外，更重要的是他的主观因素，即他敢于面对现实。

1900年9月至1902年5月，容闳因被清政府通缉而逃亡香港。1902年5月，在归国无计，又不能长期滞留香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第六次远渡重洋，到美国去度过一生中最后的10年。

在香港逗留一年多，容闳的思想开始了剧烈的变化。他认真思索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努力寻求它们的答案。

这时经过戊戌政变、上海自立会的活动、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事件，中国的情况不但没有变好，相反地，民族危机更形严重。然而付出高昂代价取得的教训是最宝贵的，人们从失败中变得聪明起来。正如孙中山通过亲身实践深切体会到的那样：“前后相较，差若天渊”，“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①。

^① 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六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199页。

很凑巧的是，1900年9月初，当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容闳在上海化装改名乘轮赴日途中，在船上遇到孙中山。这是容、孙二人的第一次会晤。他们二人之间都早已互相仰慕。在这之前，容闳就很盼望会见这位有远大志向的同乡后辈（他们都是香山县人，容较孙年长38岁），曾向旅居香港的兴中会会员、澳大利亚爱国华侨谢纘泰打听过孙中山的情况；孙中山则在日本对人表示：在中国主张改革的各派力量中，“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①。孙中山为了联络容闳等人，集结反清力量，特地于8月下旬由日本横滨秘密乘船赴沪。他抵达上海时，正好碰上自立军起义失败，清政府到处进行搜捕，他在上海无法找到容闳等人，也很难开展活动，不得不乘船退往日本，凑巧与容闳同船^②。通过这次会见，容闳对孙中山有了很好的印象，认为“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因而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勉励孙中山^③。孙中山也认为容闳是“声望素著，富新思想”，热心于改革中国的老前辈，对容格外尊敬。船抵横滨后，二人一同上岸，“在旅社闭户密谈甚久”，以后孙中山与容的堂弟容星桥又同去东京，在犬养毅宅与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内田良平等会谈。容则仍逗留在长崎，于9月7日离开长崎，前往香港^④。

与孙中山的会见，可说是容闳由改良到革命转折的起点。他开始趋于同情革命，而对中国的前途增强了信心。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198页。

② 《宫崎滔天年谱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1版；《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出版，48页。

③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出版，115页，惟所记时间有误。

④ 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杂纂》，转引自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1册，330页；《宫崎滔天年谱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又参看容应英《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与康梁》，见关肇硕、容应英著《香港开埠与关家》，广角镜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5月初版，第85页。

1900年9月中旬，当容闳由日本乘船抵达香港时，谢纘泰和他的父亲谢日昌以及李纪堂、洪全福等正在酝酿、筹划发动一次夺取广州的起义活动，准备在建立临时政府后，拥容闳为总统。容闳是完全支持这次起义的^①。在香港逗留期间，容闳对越来越腐败的清政府表示不满，时时关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要求青年应“日日有‘我为中国人’之心，即日日应办‘中国人之事’，勿为大言，只求实际”，并勉励他们说：“中国兴亡在汝等”^②。这时，容闳思想上最明显的变化是对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看法。在此之前，他同一般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一样，把义和团视为“匪”。在1900年7月，他负责起草的英文对外宣言中，还谴责义和团运动的“排外”。而在时隔不久的此刻，他却认为义和团运动代表了中国的民气，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对来访的青年学生们说，“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虽然这时他还把义和团群从看作是“下层愚氓”，但却认为通过义和团所代表的中国民气已在动起来了，而这种“下层”的运动势必“将及于士大夫”。他还以美国的独立战争为例，肯定义和团对于帝国主义斗争的正义性，勉励青年人从美国的南北革命战争中汲取力量。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新认识，他对中国的将来充满了信心，认为“东亚主人，终在中国”，期望年轻人“好为之”^③。

在美国生活的最后10年中，容闳虽然由于年事已高，不能参与很多实际工作，但他从未停止过关心祖国的活动。他与康有为、

① 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312—317页。

②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版，114—115页。

③ 《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14—115页。

梁启超以及谢纘泰、孙中山都有联系。1903年，梁启超自日本赴美游历新大陆，曾去拜访他，当时他已76岁。梁启超称他“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①。直到1908年以前，容闳还一直支持康、梁的活动。他希望把康、梁和孙中山以及谢纘泰等不管是主张改良或革命的所有力量都联合在一起，共同为拯救和改革中国而奋斗。

但是革命与保皇在当时的中国势如水火，其间并无调和的余地。正如孙中山所比喻的：“如黑白之不能混淆，东西之不能易位。”容闳经过长时期的观察、比较，终于认识到康、梁所坚持的保皇立场和主张不可能救中国，因而断定，中国只有走武装起义，进行革命这条路才有希望。他从1908年起开始对康有为有所不满。在给谢纘泰的信中，于建议维新党联合起来的同时，谴责了康有为及其保皇会。此后，他更进一步认为，康有为“并非一安全可靠之维新人物”。到1910年，他更是“强烈抨击康有为及其信徒”^②。

与此同时，容闳更加积极地拥护革命派的主张，与孙中山的关系渐趋密切。他把革命新中国的希望全寄托在孙中山身上，认为孙中山是“一很重实际的人物”。他给孙中山介绍美国同情中国革命的军事理论家荷马李(Homer Lea)和西部财界人士查尔斯·布思(Charles B. Boothe)，打算通过他们在美募集巨款和训练一批军官，以支援中国革命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虽然这项计划很不实际，而且没有实现，然而它却表明了容闳在他生命的最后

①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54页

②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资料专辑》第320页；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一册，332页（台北出版）。

几年里，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关怀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的^①。

正是由于容闳完成了这个重大的思想转变，所以武昌起义的爆发和全国各省热烈的响应的消息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当他得知这个喜讯后，立即于1911年12月19日、22日、29日先后三次写信给在香港的谢纘泰，请他代为转达他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祝贺和诚恳的希望。他欢呼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领导了这次了不起的大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并且希望他们坚持建立一个真正共和国的目标，不要同“政治骑墙派”和野心勃勃的“大阴谋家”袁世凯妥协。他主张必须把袁世凯和清朝统治者一起撵走，反对当时由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南北议和”，说“一点儿也不要相信袁世凯通过他的喉舌唐绍仪对你们说的话”。最后，他呼吁革命队伍加强团结，把中国建成“一个模范共和国”。

容闳生于灾难深重的中国，青少年时期就立志改变中国的现状，企望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了“改革和复兴中国”，他奋斗了一辈子，在黑暗的旧中国摸索前进，历尽艰辛挫折，终于由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正如谢纘泰对他评价的那样：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戴学稷 徐 如

（本文系1983年9月在广州—新会—南海举行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收录于《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

^① 详见戴学稷，徐如：《爱国华侨学者容闳》（下），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2期，此处不赘述。